

高步瀛與《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

車禕

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

二十世紀初，影印出版《四庫全書》曾多次引起社會各界的爭論。當時擔任社會教育司司長的高步瀛，曾先後三次參與清點文津閣、文溯閣和文淵閣藏本，並就流通《四庫全書》等相關問題請教四庫學專家陳垣。在此基礎上，他率先提出以選印代替全印、影印孤本與罕見本等主張，並撰寫了〈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指出了《四庫全書》的價值與局限。這些活動直接推動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最終選目與影印出版，反映了高步瀛在《四庫全書》的研究與保護方面所做的獨特貢獻。

關鍵詞：高步瀛 《四庫全書》 選印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高步瀛與《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資助，項目名稱「清代散文批評的理論演進及文獻研究」，項目批准號 18YJC751073。

前言

清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雖然其「寓毀於修」的做法自成書之日起就飽受世人詬病。但無可否認的是，這部叢書構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學術體系，代表了當時中國人在傳統知識世界各領域所能夠達到的廣度和深度。然而，由於《四庫全書》修成以後分藏秘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普通讀書人基本沒有機會閱讀，而熟習這些書籍內容的學者更是少之又少；加之晚清以來的內憂外患，天災兵燹，到了民國年間，《四庫全書》七部鈔本已「散佚過半」、「淪亡可慮」。¹如何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四庫全書》，成為了擺在民國文化界眾多學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早在二十世紀初，隨著珂羅版工藝的傳入，便有有識之士建議將《四庫全書》攝影印刷出版。關於影印一事略有爭議，大體可分為「全印」與「選印」兩派，前者以金梁（1878–1962）、葉恭綽（1881–1968）、張元濟（1867–1959）、高夢旦（1870–1930）為代表，也曾多次籌劃，但屢屢因戰亂、經濟危機等原因而被迫中止；後者以學者高步瀛（1873–1940）為首倡，雖然也幾經坎坷，但終於在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四庫全書》選印本，題名為《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如今看來，有所擇取和揚棄的選印，更有利於發揮《四庫全書》的學術價值，同時彌補「寓毀於修」的缺憾。在一以貫之地堅持選印主張的背後，是高步瀛基於對文津閣、文溯閣、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的深入調查研究所形成的獨到見解。

一、高步瀛與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的初次接觸

高步瀛，字閩仙，霸縣（今河北霸州市）人。清末時曾在學部任圖書局主編，民國成立後改學部為教育部，高步瀛又任教育部僉事、編審處主任。民國四年（1915），高步瀛升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其間他曾因工作需要，第一次接觸了文津閣本《四庫全書》。

1 鄭鶴聲：〈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圖書評論》第2卷第2期（1933年），頁67。

關於高步瀛文津閣《四庫全書》的細節，並不見於當時的檔案，而是見於與高步瀛頗有私交的皖系軍閥徐樹錚（1880-1925）的一段文字。1920年，高步瀛母親張太夫人八十壽誕，徐樹錚送來厚禮，並熱情地撰寫了壽序，序中言及如下情況：

吾友高君閔仙以孝廉任本省各大學教務，調學部為圖書局總務課長，洊補主事，入民國任教育部司長兼圖書館長。自辛亥之冬，孝定景皇后從民之欲，捐天下於民，故時觀遊之所亦不私為己有，於是避暑山莊所度藏《四庫全書》移歸教育部，閔仙主之，方籌架閣之具未得。一日語於余。余偶遊武英殿，見空閣子堆積宇下甚多，因為君取之，修短適合，即此書故物也。閔仙大喜，每向人述余之精敏。君之知余，自此始也。²

這段文字，清晰地回憶了高步瀛在任職民國教育部期間，主持接收、清點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的往事。那麼，既然是「移歸」，為甚麼書與書架沒有在一起？這裡有一段波折。

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是七部《四庫全書》中的第四部，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成書，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運往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內收藏。清宣統元年（1909）七月，在張之洞（1837-1909）的建議下，清政府在廣化寺籌備建立京師圖書館，1912年正式開館，並計劃將文津閣《四庫全書》及熱河藏書調撥此處。隨著清政府的倒臺，此事不了了之。

1913年6月27日，接管了京師圖書館的民國政府教育部舊事重提，致函熱河都統姜桂題（1844-1922）云：「查本部接管前學部案卷，內有奏請撥給文津閣避暑山莊藏書交京師圖書館一件，於前清宣統元年（1909年）七月具奏，當奉依議在案。現在京師圖書館

2 高步瀛：〈《高母張太夫人八十壽言》序〉，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頁3。

已經開辦，所有前項書籍，擬即派員往取，謹先行函達。」³ 然而，內務部卻搶在教育部之前，將文津閣《四庫全書》運抵北京，暫存於故宮文華殿內。這實際上是兩個部門在爭奪文津閣《四庫全書》的處置權。當時在教育部任僉事的魯迅（1881–1936）曾在當日日記中寫道：「〔1914年1月6日〕晨，教育部役人來云，熱河文津閣書已至京，促赴部，遂赴部，議暫儲大學校，遂往大學校，待久不至，詢以德律風，則云已為內務部員運入文華殿。遂回部。」⁴ 說的就是這件事。

1915年8月6日，教育部致函內務部，指出文津閣《四庫全書》「照前清宣統元年七月奏案，應提交京師圖書館」。⁵ 8月25日，內務部覆函教育部，同意歸還。9月，由京師圖書館正式清點、接收。魯迅在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午後同戴蘆舲往內務部，協議移交《四庫全書》辦法。」⁶ 次年9月，接收工作結束。當時京師圖書館的館舍在方家胡同國子監南學，《四庫全書》就存放於後院西式平房內。⁷ 1915年8月，高步瀛被民國政府教育部任命為社會教育司司長，⁸ 接收並清點文津閣《四庫全書》成了他的分內之事。徐樹錚在壽序中提到：「避暑山莊所庋藏《四庫全書》移歸教育部，閩仙主之。」⁹ 可見，當時具體的移交手續，實由高步瀛負責協調。

那麼，既然內務部同意將全部《四庫全書》移交給教育部，又為甚麼說「方籌架閣之具未得」呢？原來，在移交過程中，內務部並非完全配合，當時古物陳列所人員「將《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一

- 3 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03。
- 4 魯迅：《日記（1912–1926）》，收入氏著：《魯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100。筆者有修改標點。
- 5 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三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32。
- 6 魯迅：《日記（1912–1926）》，頁185。
- 7 參見李致忠：《昌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761–762。
- 8 見〈命令〉，《申報》，1915年8月2日，第15256號第二版，17日，第15271號第二版。
- 9 高步瀛：〈《高母張太夫人八十壽言》序〉，頁3。

匣四函秘而不交，書架亦未能行移」。¹⁰ 也就是說，雖然《四庫全書》已全部交與教育部，但原來存放《四庫全書》的書架卻依然被「古物陳列所」據為己有，陳列所堅持保留書架及部分藏書，不願使之完璧。對於後來書與架得以合璧的原因，據徐樹錚的說法，是他「偶遊武英殿，見空閣子堆積字下甚多，因為君取之」。¹¹

北京圖書館的相關史料則與徐氏說法相齟齬，似乎是另一番情形：在古物陳列所堅持保留書架及部分藏書的情況下，京師圖書館只得於 1916 年 9 月 9 日再次呈文教育部，請求與內務部再行交涉。教育部致函內務部交涉之後仍未奏效，只好報告當時的國務院。9 月 22 日，國務院以 847 號公函形式答覆教育部，謂：「熱河文津閣《四庫全書》前經運京，由貴部度藏在案。所有該書架閣一分，現儲古物陳列所，應一併發交貴部，以資保存。除分函外，相應函達查照接洽辦理可也。」¹² 9 月 25 日，教育部通知內務部，將於 28 日派部員戴克讓及京師圖書館館員曾劬洽辦此事。9 月 30 日，京師圖書館「派館員曾劬、紀清樞會同部員戴克讓如期前往古物陳列所，與該所人員王慶恆接洽。業於九月三十日開始搬運，前後共接收書架一百零三架，計一百零七件。惟此項書架歷年稍久，朽損頗多，茲正雇工修理，一俟竣工，即可陳列」。¹³ 這才使文津閣《四庫全書》和書架合璧。

表面上看，兩種說法互相齟齬，細細尋繹，則另有隱情。1916 年 6 月，袁世凱（1859–1916）去世，副總統黎元洪（1864–1926）繼任大總統，段祺瑞（1865–1936）仍任總理，徐樹錚升為國務院秘書長，素與內務總長孫洪伊（1872–1936）對立，「孫挾黎自重，徐倚段以為抵制，幾乎無事無時不衝突」；¹⁴ 而高步瀛與徐樹錚私交甚好。一面是宿敵內務部主導的古物陳列所，一面是好友主持的京

10 李致忠：《昌平集》，頁 762。

11 高步瀛：〈《高母張太夫人八十壽言》序〉，頁 3。

12 北京圖書館業務研究委員會編：《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909–194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年），頁 81。

13 同上注，頁 84–85。

14 張國淦：《北洋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 年），頁 145。

師圖書館，作為國務院秘書長的徐樹錚自然會選擇站在京師圖書館一邊。那麼，忽略其中複雜的行政流程，徐氏「偶遊武英殿」的說法就合情合理了。

二、高步瀛對文溯閣、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的調查研究

除了文津閣本《四庫全書》，高步瀛還曾先後參與清點調查文溯閣、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這些經歷直接影響了高步瀛後來的學術方向，形成了高氏獨具特色的基於扎實版本目錄學的考據學風格。

文溯閣《四庫全書》原庋藏於奉天（今瀋陽），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曾遭到部分破壞。1915年，奉天督軍段芝貴（1869–1925）為討好袁世凱，將文溯閣所藏《四庫全書》及《古今圖書集成》運到北京，但因卷帙浩繁，棄置在故宮保和殿，無人過問。1922年，日本欲從清皇室手中購買文溯閣《四庫全書》，但在教育部和輿論壓力下，未能成事。1925年7月，由於奉系軍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獲勝，張作霖（1875–1928）控制了北京政府，奉天總參議楊宇霆（1886–1929）致電教育部長章士釗（1881–1973），稱「奉省舊物，仍歸奉省保存」。迫於壓力，段祺瑞執政府內閣會議決定歸還文溯閣《四庫全書》。¹⁵ 7月27日，¹⁶ 高步瀛等奉命赴保和殿清點核對書目，清點調查的結果是，文溯閣本《四庫全書》共計6144函，中間有殘缺。¹⁷

1925年9月，商務印書館又與段祺瑞執政府商洽，擬進行《四庫全書》的影印，這是繼民國九年（1920）、民國十三年（1924）之後第三次提出影印計畫。9月初的閣議結果，本欲以京師圖書館所藏文津閣《四庫全書》為底本影印，但由於眾人反對，又欲改為

15 瀋陽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張氏帥府志》（瀋陽：瀋陽出版社，2013年），頁192–193。

16 譚新嘉《夢懷錄》中認為清點時間在7月29日。參見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編：《文獻》第十四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頁240。

17 參見瀋陽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張氏帥府志》，頁193。清點情況又見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15。

用文淵閣本。時任社會教育司司長的高步瀛又一次受教育部之託，與清室善後委員會代表共同點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以備交付商務印書館影印。¹⁸這是高步瀛供職教育部期間第三次參與《四庫全書》的調查研究工作。據史料記載：「政府前有影印《四庫全書》之提議，曾經閣議通過影印京師圖書館所藏之文淵閣本（引者按：此處誤，當為文津閣本），嗣該館以抄錄《四庫全書》所收之費，為該館每月收入大宗，暗中反對甚力，故教育部又有影印文淵閣本之意。昨日（二十一日）下午，特派社會司司長高步瀛，僉事戴克讓、徐協貞，京師圖書館主任徐鴻寶等七人，前往清宮調查文淵閣本有無殘缺，當由清室善後委員會委派委員袁同禮，顧問胡文玉、裘善元、黃文弼等五人，又軍警四人，會同檢查，由袁啟封。」¹⁹高步瀛等人通過清點，在紛亂的書籍中發現了《清查四庫全書架榻函卷考》一書，經、史、子、集各一冊，是民國六年（1917）春「紹英、世續、耆齡派堂主事，漢章堂掌稿筆帖式，晉昌錫泉錫彬清查後所編者」。序中明確記載：「清查兩閱月，始行查完，計缺經部《四書大全》十卷，子部《天經或問前集》四卷、《天步真原》一卷、《天學會通》十卷、《鄧子》一卷、《公孫龍子》一卷、《鬼谷子》一卷、《關尹子》一卷，集部缺《李太白集補注》一卷云。」²⁰共計缺三十卷。對於所缺卷帙，則按照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繕補。高步瀛在清點《四庫全書》的同時，也積極地進行研究，一方面由於職責所在，另一方面也出於學者敏感的學術自覺。他開始有意識地對《四庫全書》相關問題進行思考，並向當時的四庫學專家陳垣（1880–1971）請教。

在高步瀛的現存著作中，我們很難找到關於他當年在教育部任職時接觸《四庫全書》的記載，而高氏日記也早已湮滅不存，難以取證。唯在陳智超編注的《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收錄了高步瀛寫給陳垣的四封書信，有兩封直接涉及《四庫全書》，可窺一斑。其一曰：

18 參見柳向春：〈吳興徐森玉先生年表〉，收入上海博物館編：《徐森玉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頁186。

19 國內要聞（二）〈文淵閣四庫全書開始檢查〉，《申報》，民國十四年（1925）九月二十四日，第二張。

20 同上注。

圓庵先生左右：

數日不晤，念念。部中同人擬流通《四庫全書》，鈔寫時間及值價均粗有計算，尚未確定，此事是否能成，今姑不論。同人令弟撰一廣告緣起，弟於此事平日未甚考究，僅就所知勉成一稿，未敢自信。同人等均深佩先生於此中歷史研求精確，特將敝草呈閱。誤處務希是正，以便修改。非獨弟一人受益，亦部中同人所亟拜賜者也。拜手以請，伏乞教正，並頌節禧。弟高步瀛頓首。一月廿二日。²¹

此信未標明年分。關於這封信的寫作時間，目前學者觀點主要有1922年與1924年兩種說法，²²其實都不甚準確。通過查索當時有關教育部流通《四庫全書》的檔案，可知此信作於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初。

1924年11月22日，教育總長易培基（1880–1937）簽發教育部第125號令，依託京師圖書館所藏文津閣《四庫全書》，設立「流通《四庫全書》繕校處」，高步瀛同鄧萃英（1885–1972）、魯迅、陳寶泉（1874–1937）等被指派為籌備員，負責流通繕校各項規章及接洽事件。²³高步瀛信中說「部中同人擬流通《四庫全書》」，很明顯指的就是此設立繕校處之事。該機構1924年底才設立，故書信

21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頁373。

22 劉曉亮：〈高步瀛致陳垣書札考釋〉，《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頁54–57；章宏偉：〈故宮學術的濫觴（一）〉，《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頁7–16。

23 見《江蘇教育公報》1924年第7卷第11期，頁5。文稱：「查本部直轄京師圖書館所藏文津閣《四庫全書》，搜羅宏富，實為吾國數千年學術薈萃之淵府，亟應設法廣為傳布，以盡本部敷宣文化之職責。現經部務議決，設立流通《四庫全書》繕校處，應派鄧萃英、秦汾、陳任中、范鴻泰、陳寶泉、俞同奎、高步瀛、袁家普、許寶駒、洪達、錢稻孫、喬曾劬、吳忠本、胡家鳳、顧兆馨、吳震春、戴修鷺、謝冰、沈彭年、馮承鈞、周樹人、徐協貞、王家駒、趙楨、楊廉、戴克讓、王祖彝、高魯、徐鴻寶、王道元、黃中塏、王丕謨、常國憲為籌備員，所有流通繕校各項規章及一切接洽事件，應速會商，妥為酌定，以憑核辦。此令。」原由魯迅收執，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結尾的「一月廿二日」，應在此前後，也就排除了 1922 年的可能。如果是 1925 年 1 月 22 日，距設立繕校處剛剛兩月有餘，「廣告緣起」可以充分發揮其時效性，因此這封信寫於 1925 年是可能的；又經查，當年 1 月 22 日對應的是農曆正月初三，春節甫過，信中「並頌節禧」之語又有了合理解釋。由此可見，1924 年到 1925 年間，高步瀛開始更加深入地調查研究文津閣《四庫全書》，並開始思考將其影印出版、普及於民間的問題。此後不久，高步瀛又致信陳垣，對其告知「文宗閣」不可作「文淙閣」一事表達謝意，信中寫道：

圓庵先生有道：

前奉賜覆並文宗閣證據，佩服無似。前弟頗信《午風堂叢談》，故定為從水之淙。公引清高宗詩，似又較鄒氏為確。名從主人，可無異議。轉告同人，均以為是，已遵大教改為文宗矣。一字之師，頂禮無已。謹此鳴謝，諸惟筌鑒。並頌春禧。弟高步瀛頓首。二月四日。²⁴

這封信與上一封信極有可能是前後相連，均寫於「設立流通《四庫全書》校繕處」之後。根據此信內容可知，高步瀛之前相信《午風堂叢談》所說的，鎮江金山寺度藏《四庫全書》的藏書樓名稱為「文淙閣」，因為其他六閣均從「彡」旁，有以水克火寓意。陳垣去信，以乾隆御製詩為證，糾正了這一錯誤。文宗閣建成後，乾隆曾為此閣題詩三首：〈題文宗閣〉、〈再題文宗閣〉、〈題文宗閣疊庚子詩韻〉，均取「百川宗海」之意，²⁵ 信中所言「清高宗詩」，當出自其中。至於高步瀛所言讓他「頗信」的《午風堂叢談》，即清代鄒炳泰（1741-1820）所著《午風堂集》中之八卷《叢談》。《叢談》卷二有這樣一段文字：「四十七年七月，又命於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

24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頁 373。寫信時間當在 1925 年初。

25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四集》卷六九、卷七三，《御製詩五集》卷四。收入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308 冊，頁 441、498；第 1309 冊，頁 298。

鎮江口金山寺文淙閣、杭州聖因寺文瀾閣……」²⁶ 誤將「文宗閣」作「文淙閣」。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信中提及的「前奉賜覆」，當指陳垣對高步瀛所撰「廣告緣起」的回信，而所謂「並文宗閣證據」，應是「廣告緣起」中涉及了《四庫全書》的版本問題，且誤把「文宗」作了「文淙」。高步瀛隨後說「轉告同人，均以為是，已遵大教改為文宗矣」，正與前一封信「同人令弟撰一廣告緣起，弟於此事平日未甚考究，僅就所知勉成一稿，未敢自信。同人等均深佩先生於此中歷史研求精確，特將敝草呈閱。誤處務希是正，以便修改。非獨弟一人受益，亦部中同人所亟拜賜者也」之語前後呼應。前後兩封信相隔不過十餘天，分別在春節前後，故有「並頌春禧」之語。

以上兩通寫給陳垣的書信表明，高步瀛在清點各本《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開始研究「四庫學」相關問題，並形成了自己的系統觀點。可惜其日記今已亡佚，與事人員也未留下太多相關文字，否則我們將能窺見高步瀛清點工作的更多細節。不過，當我們仔細地閱讀高氏著作，還是能看到《四庫全書》及《四庫總目》在他本人學術研究中的深刻影響。在著作中，高步瀛多次提及《四庫總目》，並公允地評價其得失，如說：「清《四庫書目提要》，博大弘通，為宋元書目所未有，徒以編纂不出一手，謬戾時所不免。吾友余季豫先生著有《四庫提要辨證》，精博遠過前人，他日刊為鴻編，誠不朽之大業矣。」²⁷ 其《文選李注義疏》、《魏晉文學要》、《南北朝文學要》、《唐宋文學要》及《古文辭類纂箋》等著作中，更是時時援引和辨析《四庫總目》的觀點。如在討論《昭明文選》與六朝其他總集關係時，引用《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中「文籍日興」一段來說明《文章流別集》是《昭明文選》的先導。²⁸ 又如在論及唐宋文

26 鄒炳泰：《午風堂集·叢談》卷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62冊，頁168。

27 高步瀛：《文章源流》，收入余祖坤編：《歷代文話續編（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頁1402。

28 高步瀛：〈文選序〉，《文選李注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

時，能夠以開放和全面的態度對待「八大家」和「八大家」之外的文家，並說：「竊嘗謂今日爲學，門戶之見不可存，而門徑之辨則不可不審。」²⁹ 這種不存門戶之見、講求辨章學術的治學態度，與四庫館臣所言「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³⁰ 異曲同工。以上諸例，足見高氏學問根柢於四庫之學。

總之，先後三次參與清點各個版本的《四庫全書》，對於高步瀛來說無疑是難忘的經歷，以至於若干年後，已辭去教育部公職而赴保定蓮池書院執教的高步瀛，還津津有味地向學生講述當年在故宮見到的善本秘笈。³¹ 而對《四庫全書》的調查研究，也讓他充分看到了這部書的價值與局限，為他後來提出選印方案奠定了基礎。

三、高步瀛提出選印方案的依據及其影響

對於卷帙浩繁的《四庫全書》，高步瀛有親身精確的調查研究。他曾三次冷靜地面對過這一巨大的文化寶庫，熟稔其中包括哪些坊間常見的通行本，又保存了哪些從未刊行過的珍本秘籍，哪些書籍對學術有裨補之用，哪些書籍暫時不必流行。鑑於當時國家民族的危機與國民經濟的衰弱，《四庫全書》不能不影印，也不能不加選擇地影印。因此，當 1925 年段祺瑞臨時政府提出全部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的方案時，高步瀛表示堅決反對，並提出了選印一部分的主張。他和與事同仁在提呈教育部的檢查報告中提出：

此次擬印行《四庫全書》，宣傳文化，誠民國以來未有之盛舉。但全書卷帙甚繁，外間通行之書，實居泰半。文化事業，當以供本國學者研究爲主。全書付印，非獨耗

29 高步瀛：《唐宋文學要》（武漢：崇文書局，2019年），頁1。

30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上冊，〈經部總敘〉，頁1。

31 高步瀛：《文章源流》，頁1439：「及前清中葉，海外諸國大通，凡命使聘問，各國則頒與國書，使臣齎往所至之國，親遞以通好。曾於故宮見之，裝潢巨麗，蓋以鄭重邦交，故較尋常文書優異云。」

費太多，即使成書以後，亦非一般寒士所能購置。耗財費時，而於文化普及，殊無裨益，其不便者一也。果使就原書影印，尚不失喬皇典麗之觀。今聞縮成中本小本，則本書價值既失，反足貽外人之訕笑，其不便者二也。且聞承印之人，須將該書運滬，始能開印，則道路之險，水火之虞，在在可危。萬一險出意外，則中國可寶貴之文物，自我而失，有何面目謝於國人？其不便者三也。

若用選印之法，則利害相反，有百利而無一害。試略陳之：《四庫全書》所有罕見之本，寒畯搜求，四庫名貴之處，即在於是。今選擇付印，非獨士林爭先快靚，即商店亦易於銷售，文化流行，公私兩便，其利一。選印書中，可就需用緩急，分爲三期付印，孤本最先，罕見之本次之，書雖通行而價格太高者又次之，次第舉行，得寸得尺，動有成績，其利二。諸書尺寸，定一普通程式，若欲組成全書，即從坊間購買印本，合成一書，亦不致大有齟齬，是不必印全書而全書已可成功，其利三。卷段既經選擇，印成時日，自可尅期而待，事半功倍，日少效多，其利四。³²

高步瀛等人在這份報告中提出了全印的「三不便」和選印的「四利」，頗具遠見卓識。「三不便」從讀者、出版、時局三個方面深刻剖析了全印的不合時宜，即讀者難以承擔高昂書價，縮印裝幀影響美觀，且國寶長途跋涉易遭損壞。「四利」又從文化普及、需求層次、裝幀及時效性四個方面闡述了選印的優勢：既能使出版社盈利，又能促進文化普及；按重要程度依次影印，滿足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裝幀與坊間通行書籍統一，便於讀者匹配全本；耗時短，效果好，事半功倍。

由此觀之，以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不具備全印的條件，而選印其中一部分有價值的書籍是最優選擇。究竟哪些書籍是有價

32 鄭鶴聲：〈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頁 73。

值的？高步瀛有著自己的思考，他詳細比勘《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結合過往的調查研究和對學術史的把握，撰寫了〈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以更切實地表達自己的選印主張。貫穿於此目錄表的核心理念，就是上述報告中所說的「孤本最先，罕見之本次之，書雖通行而價格太高者又次之」。

然而，高步瀛等人的提議沒有立即被採納。據《申報》記載，「議決文淵閣《四庫全書》，仍根據前次國務會議，交商務印書館，照原書樣式，複版印行，政府津貼印費三十萬元」。³³按計劃，文淵閣《四庫全書》應分批次交付京師圖書館，再與上海商務印書館接洽影印事宜。可是後來，隨著浙、奉戰事忽起，加上清室善後委員會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既歸該會保管」，「萬不能使劃歸他處」³⁴為由加以阻撓，這個全部影印的計畫又不了了之了。³⁵

1927年，張作霖入京主政，高步瀛憤然辭去教育司長之職。1928年，張學良公開表示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並大張旗鼓地籌備款項之時，³⁶東北學者董濤（1892–1931）則站出來公開提倡選印，反對全印，並於1930年撰寫〈選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議〉一文，對高步瀛等人的選印主張進行了補充和發展。董濤進一步從內容的刪改、棄取、忌諱等方面論證全印的不合理與選印的必要。高步瀛則完全同意董濤的倡議，他將自己此前撰寫的目錄表整理為〈四庫全書選印書目〉，與董濤的倡議書一同發表在《東北叢刊》第十五期，表前有東北學者金毓黻（1887–1962）的一段識語，裡面寫到：「此高閩仙先生所選書目也。每種備載本數、葉數，尤為難得。……其有與《簡明目錄》微有異同，及就參稽所得知有刻本

33 〈國內要聞·記二十四日國務會議〉，《申報》，1925年9月27日，第18886號。

34 《申報》1925年10月2日第18891號〈國內要聞·清室善後委員會重要會議〉：「文淵閣《四庫全書》，僉以本委員自接收故宮以前，以宮內物件不得移出宮外為原則，文淵閣《四庫全書》既歸本會保管，自為宮內之一部分，況該閣地點適中，建築得法，又為專置《四庫全書》而建，亟應將此歷史上遺跡保存，以重古物。今故宮圖書館籌備告竣，不日開放，萬不能使其劃歸他處。全體委員，均一致主張，至為堅決。」

35 鄭鶴聲：〈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頁80。

36 瀋陽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張氏帥府志》，頁193。

者，加以備攷。先生原有按語，亦附見焉。」³⁷

據統計，該目錄所選書籍，經部 68 種，483 本，34322 葉；史部 15 種，195 本，14468 葉；子部 16 種，131 本，9874 葉；集部 78 種，443 本，21418 葉。共計 177 種。該目錄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為主要依據，提倡選錄海內孤本，或為學者所最需要而不易購得者，分為「最要」、「次要」二種，臚列其要。董濬還在高步瀛的書目下，備注了陳垣所檢記的每種書的冊數和葉數。³⁸ 高步瀛則謙虛地表示：「選取匆卒，此亦不過據以作例，假若刊印，則可另聘海內鴻儒碩學，各就專長，分別精選。」³⁹ 同年秋，原來主張全部影印的金梁（1878–1962）也放棄了前說，他編撰了〈四庫全書孤本選目表〉，選出首要書籍 241 種，次要書籍 153 種，合計 394 種，在高氏選目的基礎上多出 217 種。

然而，不久之後的「九一八」事變不僅使影印計畫破產，也使文溯閣《四庫全書》淪落到日本人手中。不過，雖然影印文溯閣本暫時已不可能實現，但影印文淵閣或文津閣本依然可行，在內憂外患的當時，甚至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這時，第五次影印計畫已經開始醞釀。

1933 年 2 月到 6 月，在教育總長朱家驊（1893–1963）的積極呼籲下，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與商務印書館協商，正式籌備印行《四庫全書》未刊本。初步擬定的〈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選目 366 種，一經公布，立刻在學界引起了激烈爭論。當時，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1895–1965）、善本部主任趙萬里（1905–1980）主張以善本代庫本，並將文淵、文津閣本進行互勘，這一主張得到了蔡元培（1868–1940）的支持。陳垣更是在〈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上標注出 52 種應剔除的通行本，並進行了嚴密論證。此時已名滿天下的魯迅在〈四庫全書珍本〉一文中，不無嘲諷地將南京國民政府和商務印書館斥為「官商」。他寫道：「學界的主張，是不會通過的，

37 高步瀛：〈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東北叢刊》1931 年第 15 期，頁 1。

38 同上注，頁 1–17。

39 文末附董濬〈選印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議書〉。同上注，頁 18。

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⁴⁰ 正為魯迅所言中，最終的方案仍是「依照《欽定四庫全書》」，從庫本中選擇性影印。

黃愛平曾在《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介紹，當時教育部根據董康（1867–1947）、傅增湘（1872–1949）等學者的意見，對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起草的〈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作了修改，擬定 343 種。隨後又聘請陳垣等專家學者，成立「編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對〈草目〉再作討論修改。經各委員書面交換意見以及集中開會商議後，從〈草目〉中選出 143 種，新增 37 種，總共 180 種，定名為〈四庫孤本叢刊目錄〉。其後，柳詒徵又參考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的〈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北平圖書館的〈影印四庫全書罕傳本擬目〉，以及編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的〈四庫孤本叢刊目錄〉，剔除其中有宋、元、明及近代刊本和四庫底本各書，擇定 206 種，匯總為〈選印四庫秘書擬目〉。至 1933 年 10 月，教育部再次召集有關專家學者，對上述各種目錄詳加討論，斟酌取捨，編定〈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計經部 61 種，史部 19 種，子部 34 種，集部 107 種，總共選書 231 種。決定分裝 1960 冊，分四期陸續出齊。前後延續半年多的選目工作，至此方告一段落。⁴¹

四、高步瀛的選印書目與最終實際選印書目之比較

通過對比高步瀛的〈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與教育部最終確定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表 1、表 2）就會發現，後者的經、史、子、集四部所選書目與前者重合頗多，可見高步瀛所擬選目對最終確定選目產生了一定影響。但由於文獻種類、數量實在龐雜，各方也只能根據各自標準舉其大端而已。此外，高步瀛的目錄表還結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對所選書名及作者異文作出標注，並標明闕卷情況和其他版本信息，不僅止於目錄，更便於學者使用。

40 魯迅：《准風月談·四庫全書珍本》，收入氏著：《魯迅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83。

41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423–424。

表 1 〈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與〈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
選書數目對照表

	高步瀛提議 影印（種）	《珍本初集》 影印（種）	重合數目 （種）	《珍本初集》未選 書數目（種）	高步瀛未選書數目 （種）
經部	68	62	41	27	21
史部	15	19	6	9	13
子部	16	34	2	14	32
集部	78	117	29	49	88

表 2 〈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與〈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目錄〉
選書種類對照表

		高步瀛選（種）	《珍本初集》選（種）
經部	易類	19	26
	書類	4	3
	詩類	7	6
	禮類	4	3
	春秋類	18	11
	五經總義類	5	5
	四書類	7	1
	樂類	1	1
	小學類	1	4
史部	編年類	2	1
	紀事本末類	1	2
	別史類	0	1
	詔令奏議類	1	2
	傳記類	1	2
	地理類	2	3
	職官類	3	3
	政書類	4	2
	目錄類	0	1
	史評類	1	2

		高步瀛選（種）	《珍本初集》選（種）
子部	儒家類	4	4
	兵家類	0	1
	醫家類	3	3
	天文演算法類	0	3
	術數類	0	12
	藝術類	4	2
	譜錄類	1	1
	雜家類	0	5
	類書類	2	3
集部	別集類	78	105
	總集類	0	12

以經部為例。《珍本》的「易類」有 26 種，與高氏目錄重合者有 16 種，去掉了 3 種，增加了 10 種。其中有 5 種版本在清末民國是可見通行的。而剔除的 3 種，分別是宋人鄭剛中的《周易窺餘》、元人吳澄的《易纂言外翼》、明人崔銑的《讀易餘言》，其實都屬於罕見本。

《珍本》所選「書類」三種，高氏目錄全部選錄，高氏選目另多出了宋人魏了翁的《尚書要義序說》，並附按語「有蘇州局刻本」。「詩類」《珍本》選入 6 種，其中 4 種與高氏目錄重合，刪去 3 種宋元刊本，而補入 2 種清代版本，分別是顧棟高《毛詩類釋》及《續編》、黃中松《詩疑辨證》。「禮類」高步瀛選了 4 種，《珍本》只取其中清蔡德晉《禮經本義》，而增宋王昭禹《周禮詳解》及張慮《月令解》。

對於「春秋類」，高步瀛選 18 種，《珍本》選 11 種，其中重合者 9 種，《珍本》所不取者有宋、元版本 5 種：呂祖謙《左傳續說》、戴溪《春秋講義》、洪咨夔《春秋說》、程端學《春秋三傳辯疑》、王元傑《春秋讞義》；明本 1 種：石光霽《春秋書法鉤玄》；清本 3 種：俞汝言《春秋平義》、吳鼐《三正考》、葉西《春秋究疑》。所補 3 種皆明刻本：熊過《春秋明志錄》、王樵《春秋輯傳》、楊于庭

《春秋質疑》。

《珍本》「五經總義類」與高氏目錄所選完全相同。高氏目錄比《珍本》多出「孝經類」，選書一種，即明人項霖的《孝經述注》。「四書類」高步瀛選了7種書，《珍本》剔除6種，留下了其中宋袁甫所撰《蒙齋中庸講義》。「樂類」高步瀛選了明倪復的《鐘律通考》，僅有清鈔本，而《珍本》選了清應撝謙所撰《古樂書》。後者有民國十五年（1926）的《寶彝室集刊》本，實不為罕見。

「小學類」高氏只選了清周靖的《篆隸考異》，此書未有刊本，僅有康熙間鈔本一種，係文徵明後人繕寫，極為珍貴。而《珍本》在此基礎上又增添3種，分別是宋歐陽德隆撰、郭守正增修的《增修校正押韻釋疑》（有宋刻本），明焦竑的《俗書刊誤》（有明刻本），清乾隆敕纂的《欽定音韻述微》。

在對照比較中，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即對於四部各小類，《珍本》全部照顧到，每類至少選擇一種；而高氏則有很多小類付諸闕如，包括史部別史類、目錄類，子部兵家類、天文演算法類、數術類、雜家類，集部總集類。對於沒有這些小類的原因，高步瀛沒有在目錄中交代，不過根據其「選錄海內孤本或非孤本而為學者所最需要而不易購得者，分為最要、次要二種」的思路，很可能因為這些小類涉及的一部分書籍較易購得，而一部分書籍並無重要的學術價值。從中也能看出高步瀛在「孤本」、「罕見本」概念上的獨特理解。

從選目的對比可以看出，高步瀛所選基本貫徹了選印孤本與罕見本的思路，他所擇選的書籍中，宋人著作105種，元人27種，明人16種，清人17種，大多為稀見的鈔本，而且選擇標準是從傳統版本目錄學出發，側重於書籍的學術源流與價值，沒有面面俱到，而是呈現出寧缺毋濫的特點。相比之下，〈珍本初集目錄〉顯得更為「中庸」，著錄宋、元人著作100餘種，而所收明、清人著作達近60種之多。或許因為此目錄是在陳垣、傅增湘等版本目錄學家的反覆商討取捨下確定的，成於眾手，肯定會更加全面，同時不免有許多妥協與綜合性考量。

結論

對於選印《四庫全書》中的部分書籍以保存善本、延續文化命脈，高步瀛有首倡之功，他對影印《四庫全書》的價值判斷和可行性評估堪稱真知灼見。他提出的選印主張及撰寫的〈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引起了當時學界的熱烈反響，促成了《四庫全書珍本叢刊》的影印出版。雖然與陳垣等四庫學專家相比，高步瀛治學的著力點並不在此，但前後三次清點文津閣、文溯閣、文淵閣《四庫全書》的經歷，豐富了高步瀛的版本、目錄學經驗，這些經驗無不充分地體現在他後來的文選學、考據學當中。《四庫全書》構建了相對完善的中國傳統學術體系，而高步瀛的學術成就也恰恰得益於這種學術體系的滋養。高步瀛對《四庫全書》的研究與保護，以及對《四庫全書》影印出版的關注和促成，反映了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們對傳統文化的積極保護與理性傳承。

引用書目

- 上海博物館編：《徐森玉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1年。
- 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編：《文獻》第十四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
- 北京圖書館史料彙編編輯委員會：《北京圖書館館史資料彙編（1909—194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
- 李希泌、張椒華編：《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李致忠：《昌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高步瀛：〈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東北叢刊》1931年第15期，頁1—18。
- ：《文選李注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文章源流》。收入余祖坤編：《歷代文話續編（下）》。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
- ：《唐宋文學要》。武漢：崇文書局，2019年。
- 高步瀛編：《高母張太夫人八十壽言》。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
- 張國淦：《北洋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
- 章宏偉：〈故宮學術的濫觴（一）〉。《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頁7—16。
-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
-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
- 愛新覺羅·弘曆：《御製詩四集》。收入永瑤、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御製詩五集》。收入永瑛、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0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鄒炳泰：《午風堂集·叢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46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 劉曉亮：〈高步瀛致陳垣書札考釋〉。《廊坊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4 期，頁 54-57。
- 鄭鶴聲：〈影印四庫全書之經過〉。《圖書評論》第 2 卷第 2 期（1933 年），頁 67-105。
- 魯迅：《日記（1912-1926）》。收入氏著：《魯迅全集》第 1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 ：《准風月談》。收入氏著：《魯迅全集》第 5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 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彙編》第三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年。
- 瀋陽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張氏帥府志》。瀋陽：瀋陽出版社，2013 年。

Gao Buying's (1873–1940) Contribution to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四庫全書

CHE Yi

Institute of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acsimile edi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四庫全書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sparked off considerable debate in society. Gao Buying 高步瀛,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took part in the inventory of the three copies of *Siku quanshu* stored respectively in the Wenjin 文津, Wensu 文溯 and Wenyuan 文淵 Pavilions, and consulted Chen Yuan 陳垣 (1880–1971), expert on the collectanea, on issues such as getting it to wider circulation. Gao proposed the printing of a selection instead of the entire copy, focused on the reproduction of unique and rare editions, and compiled the “Preliminary List of Selected Titles from the *Siku quanshu* for Future Publication” 四庫全書選印目錄表, highlighting both the collectanea’s value and limitations. These efforts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Rare Books of the Siku quanshu: First Series*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reflecting Gao’s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work.

Keywords: Gao Buying, *Siku quanshu*, partial reproduction, *Rare Books of the Siku quanshu: First Series*